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辛棄疾資料彙編

中華書局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辛棄疾資料彙編



辛
更
儒
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辛棄疾資料彙編/辛更儒編. —北京:中華書局,
2007 重印

ISBN 978 - 7 - 101 - 04497 - 3

I . 辛… II . 辛… III . ①辛棄疾(1140 ~ 1207)
- 生平事迹②辛棄疾(1140 ~ 1207) - 人物研究
IV . K825 . 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29164 號

責任編輯:張耕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

辛棄疾資料彙編

辛更儒 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1/32 · 14 1/4 印張 · 291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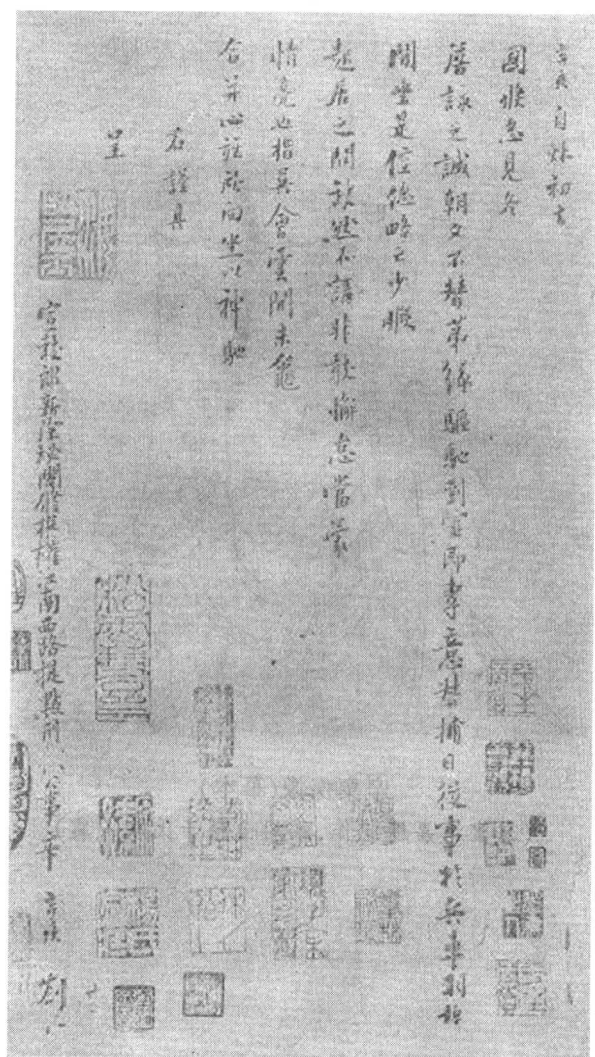
印數:3001 - 5500 冊 定價:30.00 元

ISBN 978 - 7 - 101 - 04497 - 3 / I · 588



辛棄疾像(摹本)

(原畫清嘉慶間作,藏鉛山縣辛氏族人處)



辛棄疾手迹

稼軒長短句卷之七

新荷葉

和趙德莊韻

人已歸來杜鵑欲勸誰歸綠樹如雲等閑
付與鶯飛兔葵燕麥問劉郎幾度沾衣翠
屏幽夢覺來水遠山圍有酒重携小園
隨意芳菲往日繁華而今物是人非春風
半面記當年初識在微南雲鴈少錦書無
箇因依



辛棄疾滁州琅琊山題名

前言

一

有清一代，開始搜集宋代詞人辛棄疾行實和遺作，有志於爲稼軒詞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資料的，是江西萬載縣人辛啓泰。

辛啓泰並非辛稼軒的後裔，但他於嘉慶十六年（一一八一）所刻印的《稼軒集鈔存》，及書中所附的《辛稼軒年譜》，却爲辛稼軒詩詞文的輯佚和生平事跡的編年奠定了一個基礎。可以說，後世辛稼軒研究，無論是從文還是從史的角度，其真正的起點都應以辛啓泰爲始。

近代以來，相繼搜集史料、編撰《辛稼軒年譜》的，就有陳思、梁啓超、鄭騫、鄧廣銘諸位學者。梁啓超之弟啓勳還繼承乃兄遺志，爲作《稼軒詞疏證》。不過，據鄧廣銘先生的意見，辛啓泰所著年譜，有關辛稼軒平生出處大端，除生年月日知之甚確外（因其得據《濟南辛氏族譜》和《鉛山辛氏宗譜》，自此以後，兩宗譜皆不爲學人所見），則訛誤百出。而再後所出年譜，皆爲補正辛啓泰的疏誤而作，却又因「勇於臆測，疏於尋證」，不但未能糾正辛譜之誤失，反滋異說紛紜（以上均見鄧廣銘《辛稼軒年譜編例》）。

而鄧廣銘先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編撰的《辛稼軒年譜》，就其史料考證之詳明，繫年隸事之精確來說，都要超過前此編刊的數種年譜。其中原因，是前後編寫《辛稼軒年譜》的各位，大都對宋代史事的瞭解較為朦朧和淺薄，而且對史料的搜集整理也頗為粗疏草率。舉例來說，從辛啓泰到梁啓超的一百餘年間，記載辛稼軒生平事跡的直接傳記資料尚未悉數被毀。明代廣信知府姚堂所編寫的《廣信先賢事實錄》尚流布於世，其中就收有關於辛稼軒的《畫像讀》、《事實始末》和《墓志銘》三篇文字（載有上述文字的此書下冊，一九三二年被日軍在上海投彈炸毀，而上冊目錄仍存，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源流可考），而辛啓泰等人在撰寫年譜時全都不曾加以參稽。不但如此，就是辛啓泰所參照過的《鉛山辛氏宗譜》，其中也必還包括上述被姚堂收錄過的辛稼軒傳記資料（上世紀八十年代新發現的《鉛山辛氏宗譜》，雖然只是一九四八年的續修本，且並非為辛稼軒後裔所編，但其中還是轉錄了辛稼軒的《畫像讀》和《歷仕始末》兩篇極為珍貴的資料）。遺憾的是，這些資料却全未能引起辛啓泰等人的重視。而研究辛稼軒生平所必須參證的南宋一代文獻，如史籍、文集、方志、筆乘等等，辛啓泰等人也未能廣泛加以鈎稽參證。鄧廣銘先生當時雖然未能看到兩宗譜和有關直接傳記資料，但他憑藉着宋史研究的優勢，通過搜集盡可能詳盡的資料，加以科學縝密的考證，在辛稼軒生平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人的成績，這當然由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所決定。所以，我在一九八四年發表的《跋〈鉛山辛氏宗譜〉和〈辛稼軒歷仕始末〉》一文中，對這一段歷史作了客觀的評述，並且認為：「鄧書寫成最晚，前修未備，後出轉精，原亦事理之常。」

鄧廣銘先生在撰寫《辛稼軒年譜》的同時，還編寫了《稼軒詞編年箋注》一書，對現存六百多首辛詞進行了編年，對每首詞的背景，即所涉及的人事及時、地等做了深入的考證和注釋。其取資的範圍則為辛稼軒同時人及後代人有關南宋史事、典章、地理和人物方面的著述。這本書迭經修訂，特別是發現《辛稼軒歷仕始末》一文後，更經過較大規模的增補修訂，在一九九三年出了新的增訂本。我作為主要執行者，自始至終參與了這次修訂工作。越二年，我又和鄧先生合作，出版了《辛稼軒詩文箋注》。按照我那時的估計，當時所能搜集到的有關辛稼軒研究的歷史資料，已經基本上包括在這三本著作中了。

二

辛稼軒從事於反抗女真統治、恢復北宋舊有疆土的鬭爭，並在夙志得不到伸展的情況下藉歌詞創作抒發其壯懷悲慨。而後世人論及辛稼軒，却大都以異軍突起、別創一體的詞人目之。儘管這樣的評價很難完整準確地概括辛稼軒的一生，但若僅就歌詞創作而言，無論是喜愛還是詆排稼軒詞的人，却都不能不承認辛稼軒是兩宋詞壇上最具影響力的詞人之一。

稼軒詞以其高昂的鬭爭精神，激勵着所有不甘於接受民族壓迫的愛國志士，同時，又以其深厚的藝術功力和高超的藝術技巧感染着每一個讀者。在這種情況下，南宋以來的歷史典籍中，留下了一批評論辛詞的各種言論。

然而，從南宋到清代，上下七百年間的文人詞客，論及辛稼軒及其詞作的言論，為數雖並不算少，但是，真正瞭解辛稼軒的生平及其志節、才幹，真正深入研究和闡發了稼軒詞的意蘊的人却也並不多見。單就稼軒詞的意蘊和藝術創新專門進行探索而論，清代詞學家們的論著可謂甚多，但不可否認的是，有許多言論脫離稼軒詞的實際意蘊甚遠，這主要是由於缺乏對辛稼軒本人及其稼軒詞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考求，故多鑿空無據之談。一九九一年，鄧廣銘先生為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作《題記》時曾寫出下面一段話：

除了對辛詞的結構和佈局，從形式上探求其藝術手法外，對於大量的辛詞的意蘊，即其託言於此而寄意言外的所謂「寄託」，自也應予以探索和闡發。但這所謂寄託，只能以具有深遠隱微的旨意為限，而並不是打啞謎，作密碼碼，因而不能用猜謎底、破密碼碼和作《紅樓夢索隱》的辦法去考求和對待。然而前代詞家之闡發辛詞之寄託者，却每每不免於那樣的取向。儘管其中也有偶有「不幸而言中」之處，而一般說來，則或出穿鑿，或出附會，我却是大都不以為然的。

鄧先生的上述意見，據我理解，應當是有具體所指的。一九九二年，鄧先生為解決稼軒詞《漢宮春》（春已歸來闕）的意蘊，曾寫了一篇同已故臺灣的鄭騫教授辯論的文章，即《略論辛稼軒作於立春日之〈漢宮春〉詞的寫作年份和地點》（刊《中國典籍與文化》一九九二年第二期，後收入《鄧廣銘治史叢稿》），專門批評鄭文把詞中「渾未辦黃柑薦酒，更傳青韭堆盤」解釋為譏諷韓侂胄的用人不當。然而，鄭文強作解語，說「韓的左右像陳自強、蘇師旦那等樣人，也不過等於一根韭菜而已」，把《漢宮春》詞

釋成爲影射某些當政的統治者的做法，其實就是從清代周濟那裏得到啓發的。周濟即曾評說此詞中的黃柑青韭，「極寫晏安煬毒，換頭又提動黨禍，結用雁，與燕激射，却捎帶五國城舊恨」云云（《宋四家詞選》評語）。可知鄧先生所說的「前代詞家」，至少是要將周濟等人包括在內的。所以，從鄧先生一九四〇年編寫《稼軒詞編年箋注》時起，便決定「鑿空無據之詞，游離寡要之說……概不闖入」。而到了一九九一年，他又以王安石注經時採用「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的原則自擬，這自然可見他對自己這樣處理箋注的自信。

《稼軒詞編年箋注》一書極少採用歷代詩文評或詞話一類著作，同一般的古典文學箋注本確實有所不同，自有其價值和特色，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便把歷史上所有關於辛詞的文學評論一概而論，以爲不過都是「鑿空無據之詞，游離寡要之說」而已。公正地講，其中絕大多數言論還都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因而對研討稼軒詞的藝術特色、風格、流派、詞體創新的得失，以及幫助我們理解某些稼軒詞的意蘊，具有參考作用。即使其中那些「鑿空游離之詞」，因其反映了清代詞壇繼承稼軒詞風的某種弊端，對今天的辛詞研究也不無啓發。因此，我們對這樣一大批資料，不能置之不理，束之高閣，不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三

既有了自辛啓泰到鄧廣銘再到當代的辛詞研究者的充分資料積累，又有了歷代文人詞客的衆多

涉及辛詞的評論，辛稼軒的資料原本已經完備。然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和《辛稼軒詩文箋注》出版以來，我就覺察到這兩本書中還有相當多未盡之處亟待補充，某些缺憾尤須糾正，而經過前輩學者和當代學者的努力所搜集到的資料，尚不足以解決這些問題。

同時，我還注意到，雖然近代以來，辛稼軒和辛詞研究漸次成為熱門話題，據統計，不論是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三十年間，還是從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五十多年間，辛稼軒研究的專著和論文都居於宋詞各家研究總數的前茅。但是，在充分肯定近百年來辛稼軒研究取得超越前代的輝煌成果之餘，我們還應清醒地看到，並不是所有關於辛稼軒生平的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也不是所有關於稼軒詞的藝術成就和藝術特徵方面的探討都取得了一致意見。在相當數量的論文和專著中，不重實證，任憑主觀臆斷處理學術問題的情況時有發生，以致在辛詞研究中同樣存在着各種奇談怪論。形成這種風氣的原因之一就是不重視史料的搜集和積累，而有關辛稼軒和辛詞資料的分散與湮沒不彰更是使研究者深為苦惱之事。

我已經覺察到，這項資料的搜集工作遠沒有結束。因此，我又萌生了繼續搜集資料的想法。

這幾年，隨着我國經濟實力和國力的不斷提昇，文化學術事業得到了更多財力物力的支援。一些大型的新舊叢書得以編輯出版，比如與《四庫全書》有關的幾種叢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又比如《古籍珍本叢書》、《中國地方志集成》、《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中國野史集成》，以及《四庫全書》和《四部叢刊》的電子

版等等，搜羅宏富，彙集了許多珍稀藏本，使文史工作者的視野更爲開闊，可以索取資料的方式更加簡明方便。辛稼軒研究資料的搜集整理，就在這樣一種更爲有利的環境下重新開始了。

四

辛稼軒是南宋時期值得尊敬的愛國志士，又堪稱傑出的思想家和軍事家，更是獲得後人普遍讚譽的偉大詞人。他的傳奇一生，令後世無限仰慕，也讓學者們產生極大的研究興趣。元人于欽曾說：

稼軒豪傑之士，枕戈待旦，有志於中原久矣。宋人舉國聽之，豈無所成？侂冑之敗，正陳同甫「真虎不用，真鼠枉用」之所致，以此議公可乎？（《齊乘》卷六）

明人錢士升說：

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南宋罕有其匹。……使稼軒得握生殺之權，予之以不中制之任，忠義慷慨，必能鼓舞一世。進則爲折衝，退則爲保障，精采規模，自有大可觀者，非若空言之無補也。（《南宋書》卷三二）

元人王惲也有詩句道：

千古《美芹》高議在，不應成敗論終初。（《秋澗集》卷二二《萬里江山圖》）

清聖祖玄燁甚至說：

君子觀棄疾之事，不可謂宋無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駕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漢光武，其功業

奚止是哉？（《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五）

這些近世或異代人的推獎和追慕，都說明辛稼軒的卓犖非凡，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位值得讚揚和宣傳的人物，何況其詩文自足以不朽，而其成就極高的詞作更佔據着兩宋詞壇上的重要位置。

然而，由於歷史上的種種原因，《稼軒集》在明清之際佚失，有關《稼軒集》和辛稼軒生平事跡的存世資料非常之少，這使許多辛詞研究者感到十分困惑。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鄧廣銘先生曾指出：

稼軒辛氏事跡，因其文集之失傳，半已湮沒不彰。……是譜對材料之收輯，以細大不捐為原則：披覽所及，其中凡有涉及辛氏之單詞隻字，均加以鈎稽而分別甄錄，期能集枝節為輪廓，積破碎為整體，辛氏行實之一般，庶可概見。（《辛稼軒年譜編例》）

鄧先生在收集辛稼軒資料的過程中既堅持有聞必錄的原則，遂使其所作《年譜》及《箋注》能夠超越前輩和同時的著作，為辛詞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後來的學者還能在這方面做出微細的貢獻，也都是履踐上述原則的結果。

當然，學術研究是無止境的。說某一階段的研究成果為登峰造極之作，只能是相對而言。以稼軒詞研究而論，無論是在資料的搜集整理還是論述之切實嚴謹，後人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總能做得更好。按古人的觀點，做學問的讀書人應當博極羣書，貫穿經史百家，網羅放失舊聞，考之行事。只有做到這一點，才有可能成為成一家之言的學者。我們每一個後學者，當然要以此為目標。我在編輯這本《稼軒資料彙編》中深切地領會到這樣做的艱難，但捨此並無他途。

收集在這本資料彙編內的有關辛稼軒生平事跡資料和詞學資料，是這幾年中通過不斷的挖掘和一點一滴的積累彙集而成的。值得自慰的是，經過努力，畢竟在已經發表的有關辛稼軒研究資料的基礎上，又發現了相當數量的新資料，為今後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動力。以下讓我僅就這次所發現的若干辛稼軒生平資料作一綜述和評論：

1. 乾道九年（一一七三）正月三日，大雪，後二日，滁州守臣辛棄疾同好友周孚、通判燕世良以及陳弛弼等十一名僚屬登琅琊山，題名石壁。此事見於現存題名。舊有的安徽和滁州金石志均不載此題名，增訂本《辛稼軒年譜》自不載此事，亦未考及燕世良等行實（按：此十一人當包括滁州通判、判官、推官、參軍、教授及滁縣知縣、縣丞等屬吏。其中燕世良此年任通判，見《滁州志》。燕世良字文伯，後來仕至大理正、大理少卿、戶部侍郎。李揚，應即周孚《蠹齋鉛刀編》多次提到的延安人李清宇，其字當取『激濁揚清』義。稼軒詞中也涉及李清宇。李浦，應即《江西通志》所記載的紹興二十年解試合格的廬陵人李浦。可知，此題名極具考證價值）。

2. 淳熙五年（一一七八），辛棄疾在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任內，組織人力，創築豐城縣兩埭於寶氣亭前濯纓巷口，以殺奔湍。此為豐城創埭之始，歷來史籍均未涉及。稼軒於淳熙四年冬移江西帥，明年春三月被召，在任時間極短，而猶有為民興利之政績。《江西通志》詳載其事，並收錄了明人楊廉所寫的《豐城縣新埭記》，其中有云：

豐城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堤而已。然諸堤以縣治之堤為要，縣治之堤以埭為

要。是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堤之有埽，自宋淳熙間辛帥棄疾始，繼此而能留意者，惟端平間邑人徐侍郎鹿卿。到國朝洪武間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皆忽不知務，波濤噬及，則退而示弱，而堤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潰散而已。

對辛稼軒創埽功績之卓越，予以高度評價，並以用兵出奇制勝作比擬。此事估計在明清方志如嘉靖《豐乘》及幾種《豐城縣志》中還能找到更詳盡的資料，亟應鉤輯出來，以補《年譜》的闕失。

3. 淳熙九年（一一九三）九月，友人朱熹自浙東西歸，途經上饒，與辛稼軒會於南巖。《年譜》僅舉《朱子年譜》及韓淲《訪南巖一滴泉》詩以證其事。今據元戴表元《遊南巖詩序》以及明鄭真《遊南巖》詩，知爲九月二十八日事，且均記載稼軒在南巖有題名可考。此事還可通過實地考察，得到確切的記載。

4. 紹熙四年（一一一三），辛稼軒任福建安撫使，在福州修建經史閣，收藏書籍。此事《八閩通志》及幾種《福建通志》均有記載。

5. 鄧廣銘先生的增訂本《辛稼軒年譜》係其晚年所作，所增補訂改諸事偶多訛誤。如嘉泰四年（一二〇四）記事，先有「是月，召見，言鹽法。並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爲應變計」一條，不明言「是月」爲正月，而所引《朝野雜記》、《慶元黨禁》等書都有稼軒「春正月入見」等語，這本來是沒有異議的。然而，在增訂本中却又增入陸游《送辛幼安殿撰撰造朝》詩，並補寫了一條按語云：「陸詩編次本年《上巳》詩之後，《三月三十日聞杜宇》詩之前，則其召見之命或在正月，而其自紹興啓行造